

清华简《系年》所见郑国史事初探

代生, 张少筠

(烟台大学人文学院, 山东烟台, 264005;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烟台, 264025)

摘要:清华简《系年》揭示了有关郑国的重要史料。幽王死后, 郑国依从携惠王势力。随着诸侯在“周亡王九年”倒向平王, 郑武公又因娶申侯女成为平王嫡系。大国争霸下的郑国, 成为被拉拢的对象。郑国的态度不仅造成了晋文公之后秦、晋关系的恶化, 还引发晋、楚之间的多次战争。郑繻公时期, 郑与韩、楚等时有交锋, 因与楚的战败导致内乱发生。这些资料既可补充古史之缺, 又可纠正文献记载之谬, 对研究郑国历史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系年》; 两周之际; 郑国; 郑繻公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5)03-0242-06

清华简《系年》于2011年底刊布, 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第二批。该篇记载了西周至战国初期周王室及楚、晋、秦等诸侯国的重要史事, 对古史研究有重要价值, 一经公布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笔者在研读《系年》过程中, 曾分国别进行整理, 现将有关郑国史事讨论如下, 以就教于方家。

一、两周之际的郑国

根据《史记·郑世家》记载, 西周末年, “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 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 是为武公。”^{[1](1759)}可见司马迁认为在两周之际, 郑桓公因为站在幽王一方, 被犬戎所杀。但是, “周之东迁, 晋郑焉依”^{[2](51)}, 父亲郑桓公刚刚被平王集团的犬戎所杀, 继位的武公怎么可能随即帮助平王东迁呢?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秦的立场问题。^①由于史料阙如, 学者对两周之际郑国立场问题的讨论仍停留在存疑层面。

我们以为, 清华简《系年》有关两周之际的记载, 或可为解开这一谜团提供新的资料。兹将《系年》第二章有关内容移录如下:

周幽王娶妻于西申, 生平王。王又娶褒人之女, 是褒姒, 生伯盘。褒姒嬖于王, 王与伯盘逐平王, 平王走西申。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 围平王于西申, 申人弗界, 缙人乃降西戎, 以攻幽王, 幽王及伯盘乃灭, 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 是携

惠王。立廿又一年, 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 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 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 立之于京师。三年, 乃东徙, 止于成周……^{[3](138)}

此段史料讨论的中心是“周亡王九年”, 整理者认为: “周亡王九年, 应指幽王灭后九年。”对此学者尚有争议。笔者赞同整理者的看法, 可将上述记载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从“周幽王取(娶)妻于西申”至“幽王及伯盘乃灭, 周乃亡”, 叙述幽王和伯盘的覆灭, 结果是西周灭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 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 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是第二层次, 有关余臣的事迹。余下为第三层次, 叙述的是平王的事迹。问题的关键在第二三层次, 余臣立二十一年被晋文侯所杀, 下面的“周亡王九年”, 不是接续余臣被杀, 而是叙述西周灭亡后的情况。幽王和伯盘覆灭是总述, 后面则是《系年》作者分述余臣和平王的事迹。所以这里的“周亡王九年”是指幽王死后九年。^②

从上述记载看, “周亡王九年”实际上是余臣被立九年, 但他又不被后来成为正统的周平王集团所承认, 所以仅以“周亡王九年”纪年。传世文献缺失了这一段记载, 如《国语·周语上》记“十一年, 幽王乃灭, 周乃东迁。”^{[4](13)}语焉不详, 只说明是相互接续的事件。到了司马迁的时代, 所能依凭的资料更少, 因此他在撰写《史记》时把幽王灭和周东迁系于一时, 引起后世学者对秦、郑等国立场问题的质疑。现在来看, 许多问题或可涣然冰释: 由于幽王死后, 余臣和平王有

收稿日期: 2014-06-02; 修回日期: 2014-11-03

基金项目: 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考古发现与先秦史诗、颂诗”(13BZW046)

作者简介: 代生(1981-), 男, 山东曲阜人, 历史学博士, 烟台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学术研究所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古文字与出土文献; 张少筠(1981-), 女, 山东蓬莱人, 历史学博士,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文献学

很长时间的对峙, 各有支持者而形成利益集团。从最初的情形看, “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 余臣得到了幽王集团诸侯的支持, 势力占了上风, 直到第九年, “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 见到这一情况, 晋文侯借机迎立平王。余臣的势力坚持了二十一年才被晋文侯所灭, 平王才真正成为“正统”。值得注意的是邦君诸侯的态度, 他们实际上是“正统”的决定者。诸侯“不朝于周”代表了对余臣势力的舍弃,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此事说“携王奸命, 诸侯替之, 而建王嗣”^{[2](1476)}。这些邦君诸侯, 应包括原来支持幽王的秦国和郑国。由此可以知道, 在携惠王余臣和平王对峙期间, 郑国依据形势由支持余臣转向了支持平王。

关于郑国的转向, 沈长云先生曾提出一个新的观点, 认为郑桓公并没有死于幽王之难, 相反, 他及时转向了周平王一边。^[5]沈先生缕析文献, 贯通了相关史事, 看法值得重视。如若此说可信, 那么郑桓公与史伯谋划郑国的“未来”, 说明他一开始就对幽王有了异心, 并在幽王死后审时度势转向了周平王, 《系年》中的“亡王九年”正为郑桓公的活动留下了时空的“范围”。

不过, 《史记·郑世家》载郑“武公十年, 娶申侯女为夫人, 曰武姜”^{[1](1759)}, 这里的“十年”, 司马迁言之凿凿, 当有依据。十年方娶夫人, 说明武公继位时较为年轻。前述幽王死后第九年, 是携惠王余臣和平王两大集团转折期, 申侯一直支持平王, 郑武在继位第十年娶申侯女, 我们认为, 郑桓公可能确实死于幽王之难, 武公年轻, 政治立场多是追随其他诸侯, 大约在九年时转向平王。更值得注意的是, 武公娶了平王母国——申国申侯之女来拉拢关系, 一跃而为平王的“嫡系”, 与晋国共同组成王室东迁的中坚力量。

就探究这一时期的史实来看, 上述两种解释都是可能存在的。但无论如何, 郑国的势力是在东周之初膨胀起来的, 《系年》说“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 可见凭借辅助王室的声威, 郑已经成为诸侯之长。两周之际的王位争端, 差点在武公晚年上演, 其夫人武姜因厌恶长子寤生(郑庄公), 力主立共叔段, 遭到了武公的断然拒绝, 这实在与武公对两周之际平王宜臼、伯盘、携惠王争王内乱带来的灾难仍历历在目有关。

二、大国争霸下的郑国

自厉公以后, 郑国国势日衰, 不得不依从于相继崛起的齐、晋、楚等大国。又郑处南北方要塞, 据军事之险, 成为大国争霸时拉拢和胁迫的对象。不过,

春秋时期的郑国依然可算得上大国, 其地位和影响仍举足轻重, 《系年》第八章就记载了郑国对晋、秦关系的影响:

晋文公立七年, 秦晋围郑, 郑降秦不降晋, 晋人以不慙。秦人舍戍于郑, 郑人属北门之管于秦之戍人, 秦之戍人使人归告曰: “我既得郑之门管矣, 来袭之。”秦师将东袭郑, 郑之贾人弦高将西市, 遇之, 乃以郑君之命劳秦三帅。秦师乃复, 伐滑, 取之。晋文公卒, 未葬, 襄公亲率师御秦师于崤, 大败之。秦穆公欲与楚人为好, 焉脱申公仪, 使归求成。秦焉始与晋执乱, 与楚为好。^{[3](155)}

此段史事见于《左传》僖公三十年至三十三年, 秦与郑单独媾和, 即著名的“烛之武退秦师”。秦人的做法, 激怒了晋国, 文献屡载此事。如成公十三年吕相代表晋厉公与秦断交时义正辞严地说: “郑人怒君之疆场, 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师围郑, 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 擅及郑盟。诸侯疾之, 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 绥静诸侯。秦克师还无害, 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2](862)}可见, “不询于我寡君, 擅及郑盟”成为秦被晋国抓住的一个把柄。这段记述指出相约伐郑的, 还有其他诸侯, 不过未提及是哪些国家。而据《左传》僖公三十年载, 只有秦晋两国。而且事后主张讨伐秦国的, 是晋文公的舅舅子犯, 晋文公念及秦国曾帮助他复国即位, 才没有采取行动。《系年》则证实了僖公三十年的记述, 围郑的是秦晋两国联军。秦从自身利益出发, 违背了秦晋联合出师的诺言, 造成了“晋国不慙”。吕相所说“诸侯疾之”, 可能是他在指斥秦国时故意夸大声势, 当然也可能确有其事, 因为晋同盟下的诸国要为晋“打抱不平”。

晋、秦相约伐郑, 形成了“盟约”的关系, 秦背弃盟约, 单独受降, 自然会招致晋人不满。春秋时期同类的事情时有发生, 如《左传》庄公八年“鲁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仲庆父请伐齐师”^{[2](173)}。由此可见, 诸侯相约讨伐他国, 绝不可以单独受降。^③况且, 秦人在受降后还与郑国盟誓, 并派兵帮助郑国守城。

由于秦国始终怀着东侵的野心, 当戍守在郑的秦国官兵拿到郑国城门钥匙时, 秦穆公就迫不及待地派兵去偷袭郑国。因郑国商人弦高的“犒师”, 秦认为郑国已有戒备, 才取消行动。后来晋襄公借机派师袭秦, 秦人大败于殽, 损失惨重。因此《左传》襄公十四年载: “昔文公与秦伐郑, 秦人窃与郑盟, 而舍戍焉, 于是乎有殽之师。”^{[2](1006)}表面上看, 秦晋关系的恶化, 导因在秦, 而根本利益的分歧在郑。因为他们都想在扩张道路上将郑国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 郑国

实际上在两个野心勃勃的国家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烛之武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故意分化秦晋关系的。《系年》“秦焉始与晋执乱,与楚为好”正是郑国故意降秦不降晋造成的。正如童书业先生所言:“围郑之役却成了文公复国以后秦晋两国决裂的先声。”^[6]

在晋、楚两国争霸过程中,郑国处在两国之间,颇受其害。如城濮之战,郑国先是依从于楚,楚败后则立即倒向晋国。吕静先生指出,从楚庄王六年(公元前608年)到十七年(公元前597年),楚国频繁征伐郑、陈、宋三国,并通过盟誓,强迫三国服从于楚。“笔者整理《春秋》和《左传》记载的结果,从鲁宣公元年(前606)到宣公十二年(前579),楚国与郑国九次、与陈五次、宋两次,共举行了十六次的‘伐’,或者‘平’和‘盟’。”^[7]会盟在春秋时期是诸侯国维系自身安全和利益、开展邦交的重要活动,后来演变为大国借主盟来控制小国、取得霸权的一种形式。在大国的主持下,其他国家须在神灵的监督下进行宣誓。盟会关系一旦形成,就有了一定的约束性,如要求同盟间不得兵戎相见,共同抵抗他国以及不得背弃盟约等等。这一阶段的郑国,处在晋楚争霸的缝隙,唯大国是从,往往既得罪晋,又得罪楚。《系年》第十二章就记载了楚庄王十四年因此伐郑:

楚庄王立十又四年,王会诸侯于厉。郑成公自厉逃归,庄王遂加郑乱。晋成公会诸侯以救郑,楚师未还,晋成公卒于扈。^{[3](163)}

楚王会诸侯于厉,《左传》称之为“厉之役”。从清华简可知,这里的“役”指的是“会盟”,而非战役。^[8]郑伯逃盟,显然是对楚国“霸主”地位的挑战。在春秋时代,逃盟不仅要受到指责,更要遭到讨伐。如《系年》第十四章载齐国高厚逃盟,加上对晋国使者郤克的不敬,导致晋国伐齐。楚庄王正是因为郑伯逃盟,“遂加郑乱”^{[3](163)},再次发起对郑的讨伐。

郑国从楚倒向晋,晋则成为郑的庇护国。当楚庄公伐郑时,晋派兵救郑,甚至晋成公还死在了救郑的路上。《左传》宣公九年说:“会于扈,讨不睦也。陈侯不会。晋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陈。晋侯卒于扈,乃还。……楚子为厉之役故,伐郑。晋郤缺救郑,郑伯败楚师于柳棼。”^{[2](701-703)}这一记载与《系年》略有不同,《系年》强调晋国出师目的在于救郑。《左传》所载晋率领诸侯讨“不睦”的陈侯,实际上和楚国讨伐郑国的原因相同,即没有参加自己的同盟。因为争郑、陈而时常发生晋、楚战争,足见当时两国争霸已处在白热化阶段。

厉之会发生在楚庄王十四年,子居先生推测发生在鲁宣公九年的春夏之际,之前近十年,“晋与楚在此

期间,一直胶着于在控制陈、郑的角力过程中。”^[9]此言甚是,《春秋》和《左传》记载这一阶段晋、楚频频会盟和征战,除了郑国和陈国,晋国、楚国各自的盟约国都是比较稳定的,如晋国同盟有宋、卫、曹等国。如《春秋》记载:

宣公元年:“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晋赵盾帅师救陈。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会晋师于棗林,伐郑。”

宣公二年:“宋华元帅师及郑公子归生帅师,战于大棘。宋师败绩,获宋华元。秦师伐晋。夏,晋人、宋人、卫人、陈人侵郑。”

宣公六年:“六年春,晋、卫侵陈,陈即楚故也。”

宣公七年:“冬,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于黑壤。”

宣公九年:“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会于扈。晋荀林父帅师伐陈。辛酉,晋侯黑臀卒于扈。”^{[2](645-700)}

由上记载可知,陈国很可能因上一年冬天“陈及晋平。楚师伐陈,取成而还”,迫于压力参加了第二年春的厉之会。而宋、卫、曹属于晋的同盟国,应不会参加楚的会盟。由此看来,楚庄王主持的这一次“厉之会”,除陈国外,参加者还是那些一直附庸于楚的蛮夷之国,规模不太大,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正因为此,《左传》作者在编纂宣公九年史事时,甚至忽略了对厉之会的记述。厉之会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问鼎中原”的庄王自然十分恼火,而郑国临近盟会时才背叛,更加激怒了楚国。

种种迹象表明,郑国夹处在晋、楚之间,已然不堪重负。

三、繻公时代的郑国

进入战国时代,郑国显得更加默默无闻,以至于司马迁撰写《史记·郑世家》时搜集到的资料只有寥寥数条。如介绍郑繻公时记载:

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韩武子伐郑,杀幽公。郑人立幽公弟駘,是为繻公。繻公十五年,韩景侯伐郑,取雍丘。郑城京。十六年,郑伐韩,败韩兵于负黍。二十年,韩、赵、魏列为诸侯。二十三年,郑围韩之阳翟。二十五年,郑君杀其相子阳。二十七,子阳之党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为君,是为郑君。^{[1](1776)}

《系年》第二十三章记述了三晋、郑国、楚国间的战争,其叙事出发点在晋楚争强,也简单记述了郑

繻公当政时与楚的纷争,就研究郑国历史而言,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将《系年》和《史记》相关资料进行对比,列于表1^④。

表1 《系年》《史记》相关资料对比表

清华简《系年》 二十三章 ^{[3](196-197)}	《史记》
楚声桓王立四年,宋公田、郑伯、伯皆朝于楚。王率宋公以城榆关,是武阳。	
声王即世,悼哲王即位。	《史记·楚世家》:“声王六年,盗杀声王,子悼王熊疑立。” ^{[1](1720)}
郑人侵榆关,阳城桓定君率榆关之师与上国之师以交之,与之战于桂陵,楚师无功。明岁,晋黹余率晋师与郑师以入王子定。鲁阳公率师以交晋人,晋人还,不果入王子。明岁,郎庄平君率师侵郑,郑皇子、子马、子池、子封子率师以交楚人,楚人涉沔,将与之战,郑师逃入于蔑。	《史记·六国年表》周安王三年:“王子定奔晋。” ^{[1](710)}
楚师围之于蔑,尽降郑师与其四将军,以归于郢,郑太宰欣亦起祸于郑,郑子阳用灭,无后于郑。	《史记·六国年表》:楚悼王四年“败郑师,围郑,郑人杀子阳”。 ^{[1](711)}
明岁,楚人归郑之四将军与其万民于郑。	《史记·郑世家》:“二十五年,郑君杀其相子阳。” ^{[1](1776)} 《史记·六国年表》:楚悼王三年“归榆关于郑”。 ^{[1](710)}

通过上述探讨,可对郑国在战国时代的形势有大致了解。

其一,据《系年》第二十二和二十三章^{[3](196-197)},楚声王元年,三晋伐齐后,郑繻公、宋公田被三晋胁迫以朝周王,实际上是参加周王对赵魏韩的“册封”典礼。而楚声王四年,郑繻公、宋公田又迫于压力朝楚。宋人还帮助楚人修筑榆关要塞。

其二,郑繻公时期,郑与楚发生了多次冲突,文献不详。《史记》只在《六国年表》中注明:楚悼王三年“归榆关于郑”,四年“败郑师,围郑,郑人杀子阳”。^{[1](710-711)}《系年》则比较清楚地记载了这些史事。楚悼王即位元年,郑人就入侵榆关,楚驻守榆关的士兵和其他诸侯国合力与郑作战,结果“楚师无功”,还搭上了两个楚将领的生命。悼王二年,晋和郑联合出师以“入”王子定。据文献所载王子定为周王子,楚国派鲁阳公与晋人作战,则是为了勤周王。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王子定是楚王子,晋郑出师为干涉楚内政:

《六国年表》周安王三年(BC399年)载“王子定

奔晋”,现据《系年》可知,此王子定非周王子,而是楚王子。我推测这个王子定可能是声王之子,悼王兄弟,也是王位争夺者,这一事件可能是“盗杀声王”的后续事件。王子定奔晋后,晋人联合郑人抓住机会干涉楚政,BC398年“晋黹余率晋师与郑师以入王子定”。“鲁阳公率师以交晋人,晋人还,不果入王子。”^⑤

晋、郑联合出师的第二年,楚国就开始了对郑国的报复。这次战争,对郑国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创。楚国俘获了郑国军队,还包括其“四将军”:郑皇子、子马、子池、子封子。由于他们是当权的世族,因而引起了郑国贵族的震动。于是太宰欣发动内乱,除掉掌权的子阳一族来迎合楚国。第二年楚人将俘虏的“四将军与其万民”归还给郑。此役之后,郑国改变外交策略,服于楚。

将《史记》与《系年》合读可知,郑繻公在位时,郑国在外交方面与三晋、楚国既有战争,也有合作。如《史记》记载繻公十五年、二十三年都曾与韩发生冲突。一次“败韩兵于负黍”,一次“郑围韩之阳翟”,可见郑国实力不容小觑。《韩非子·饰邪》篇说:“郑恃魏而不听韩,魏攻荆而韩灭郑。”^[10]虽然记述的是郑繻公死后二十年郑国灭亡的事情,但从《系年》看,郑又与晋合作以入王子定,这里的“晋”可能不包括韩,因为郑韩两国刚刚发生冲突,而应是魏国。若如此,则郑繻公时已经形成了“郑恃魏而不听韩”的外交方针。

其三,《史记》记载相关史事的年代有误。据上表,《史记》说王子定奔晋在周安王三年,即楚悼王三年、郑繻公二十四年,而《系年》载晋联合郑入王子定,已然在楚悼王二年;《史记》楚“败郑师,围郑,郑人杀子阳”在楚悼王四年,郑繻公二十五年,而《系年》认为是楚悼王三年事;《史记》载楚悼王三年“归榆关于郑”,整理者以为即《系年》楚悼王四年“楚人归郑之四将军与其万民与郑”一事。综合来看,《系年》以上诸事详按楚王纪年排列,较为可信,《史记》则可能记载有误,当加以修正。

四、《系年》所见郑国史料的特点

晁福林先生曾将郑国的政治发展归纳为四个阶段,即从郑武公开始到郑厉公,为第一阶段,是郑国的全盛时期;从郑文公到郑成公的百余年间是第二阶段,郑国势力有所削弱,外交政策首鼠两端,摇摆不定;从郑简公开始到春秋末年,是第三个阶段;战国

时代的郑国时第四阶段,政局不稳,屡生内乱。^[1]

《系年》对郑国的历史发展也有阶段式的“划分”。如第二章内容记载“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武公即世,庄公即位;庄公即世,昭公即位,其大夫高之渠弥杀昭公而立其弟子眉寿。齐襄公会诸侯于首止,杀子眉寿,车高之渠弥,改立厉公,郑以始正。”^{[3](138)}就史料记载而言,郑武公之后的君位继承和内乱,《系年》仅用50多字描述,实际上完全可以省略,但作者依然从武公叙述至厉公:郑武公正东方之诸侯,即文献所载武公为诸侯长,厉公时“郑以始正”。可见作者是将这一阶段看作郑国政治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划分与晁先生的分析若合符节,体现了《系年》作者对郑国历史的发展“了然于胸”。第八章、十二章郑国的记载,属于郑国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晁先生所言“首鼠两端,摇摆不定”。第二十三章的记载,是郑国发展的第四阶段,展现了郑国的内外形势,如太宰欣内乱与灭子阳一族,郑与楚的战争等等。《系年》这些阶段式的记载与后世学者对郑国历史发展的分析完全一致,对我们研究郑国的历史及政治特点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系年》叙述西周至战国历史,带有极强的总结性,如其中的“始”字:“秦以始大”^{[3](141)}、“秦晋焉始会好”^{[3](150)}、“秦焉始与晋执乱,与楚为好”^{[3](155)}等等,都是对各国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精准概况,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发展的敏锐考察。我们认为,《系年》春秋史事是围绕“强国”而言的,关于郑国发展的第一阶段,很明显是对强盛时代的郑国有意进行详细记录。在记述秦晋联合时,强调了郑“降秦不降晋”带来的后果——秦晋决裂。第二十三章的核心是晋楚因榆关、武阳之地而展开的纷争,但榆关本属于郑地,故而屡屡提到郑国。

注释:

① 《史记·秦本纪》说:“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可见秦襄公既救周,西周灭亡后又转向平王。学者对此多有讨论,如钱穆《西周戎祸考》(可参见其《古史地理论丛》,三联书店,2004年,第169页。)、《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8页)、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第21页)、王玉哲《周平王东迁乃避秦非避犬戎说》(《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晁福林《论平王东迁》(《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等。

② 关于此点,笔者《清华简〈系年〉所见两周之际史事说》(《学术

界》,2014年第11期)一文有详细论证。按,古本《竹书纪年》曰:“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侯)所杀。”无论结构还是内容,都与《系年》近似。因此,对古本《竹书纪年》的理解会影响到《系年》的解读,如上引晁福林先生《论平王东迁》一文就认为“幽王死前就被申侯、鲁侯、许文公等拥立于申,称‘天王’。”如将“先是”一词理解为“在此之前”,表追述之义,晁说很有道理。王红亮先生在讨论《系年》“周亡王九年”时发表《也说〈清华简·系年〉的“周无王九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2年1月12日)和《清华简〈系年〉中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年代考》(《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两文,后者看法与晁先生近似。但他将《系年》和《纪年》两条记载完全对等,认为既然幽王死之前平王被立,那记述平王事迹时谈到的“周亡王九年”就是周幽王九年。从年代讨论看,此说具有启发意义。不过,王先生列举文献中有关“亡王”称呼来印证“周亡王九年”,但很明显的是,亡王指亡国之君,未见用来纪年的。笔者以为,就解读两周时代与秦、郑等诸侯的关系看,当以整理者说法为妥。《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说:“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郟鄏。”文义与《系年》和《纪年》相似,且上引《纪年》就是《左传正义》所引的。“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一句,《广雅》云“建,立也”,很明显指《系年》谈及平王的第三个层次:“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那不朝周是什么时候呢?即“携王奸命”时,由此“周亡王九年”,实际上指携惠王九年,即幽王死后第九年。为何不直接称“携惠王九年”?这牵涉到平王与携惠王并立的事情,携惠王既不属于“西周”,也不属于“东周”,始终没有被平王所承认,所以只以周幽王死后九年来计。而且,晁福林先生分析传世文献中平王之“立”与《系年》晋文侯逆平王二事很可能是时间相继的关系,则没有冲突。由此可见,若将古本《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和《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三者所载合读,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周亡王九年”的含义。

③ 《左传》庄公八年“仲庆父请伐齐师”文后,鲁庄公认为不可,并有一番说辞:“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由。《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时乎!”鲁公的做法,得到了“君子”的赞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降人而不降己,表明自己修德不够,秦国单独受降,同样也让晋文公这位盟主“难堪”,只是秦曾辅助晋文公复位,秦晋已有与楚“退避三舍”相类似的要约,所以晋文公才不得不忍从。

④ 此表参考了《系年》整理者注释和陈民镇《清华简〈系年〉研究》(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指导教师:江林昌教授)相关内容。

⑤ beam.清华简〈系年〉第23章读后记。

- ⑥ <http://www.newsmth.net/pc/pcon.php?id=6504&nid=440805&or der=&tid=20749>; 除此篇外, 刘全志《清华简〈系年〉“王子定”及相关史事》也持类似观点, 见《文史知识》2013 年 6 期。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2]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3] 李学勤.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1.
- [4] 左丘明. 国语[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5.
- [5] 沈长云. 郑桓公未死幽王之难考, 上古史探研[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267-271.
- [6] 童书业. 春秋史·校订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189.
- [7] 吕静. 春秋时期盟誓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149.
- [8] 孙飞燕. 释《左传》的“厉之役”[J]. 深圳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2(2): 13-14.
- [9] 子居. 清华简《系年》第 12-15 章解析[DB/OL].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5413>, 2012-10-02.
- [10] 陈奇猷. 韩非子新校注: 上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344.
- [11] 晁福林. 论郑国的政治发展及其历史特征[J]. 南都学坛, 1992(3): 40-44.

Analysis of Zheng State on the basis of *Bamboo Slips about Xinian*(系年)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DAI Sheng, ZHANG Shaoj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Yan Tai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 Lu 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China)

Abstract: The basis of *Bamboo Slips about Xinian*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disclosed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Zheng State. After King You's death, Zheng State complied with King Hui. As all other small kings went in favor of King Ping, Zheng State acted likewise and Zheng Wugong became King Ping's direct relative by marrying Marquis Shen's daughter. At a time of wars between states for hegemony, Zheng State became the object everyone wooed. As a result, the diplomatic tactics Zheng State employed not only caused the deterioration between Qin and Jin, but also ignited several wars between Jin and Chu. In Zheng Rugong's period, there arose constant conflicts between Zheng and Han and Chu. And Zheng's failure in its war with Chu finally led to the break-out of the civil riot. Such materia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search on Zheng State by making up certain historical blank and rectifying the fallacy of some historical documents.

Key Words: *Bamboo Slips about Xinian*; the turn from the Western Zhou to the Eastern Zhou; Zheng State; Zheng Rugong

[编辑: 颜关明]